

楚辭今選校注

吳賢哲

校注

民族出版社

楚辭今選校注

吳賢哲

校注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辞今选校注/吴贤哲校注.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 - 7 - 105 - 12962 - 1

I. ①楚… II. ①吴… III. ①楚辞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0809 号

策划编辑:虞 农

责任编辑:乔 丽

封面设计:金 潇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340 千字

印 张:12

定 价:35.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2962 - 1/I · 2488(汉 270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前言

一

《楚辭》是繼《詩經》之後出現於楚國的一種新體詩。楚人所作的詩歌，在西漢時被名爲《楚辭》。《史記·酷吏列傳》：『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漢書·朱買臣傳》：『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又《漢書·王褒傳》：『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由此可見，西漢時已有《楚辭》這個名稱，且朱買臣、九江被公均以善『言楚辭』而知名於世。西漢末年，劉向將屈原、宋玉以及西漢的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和他自己的作品編爲一集，名爲《楚辭》。這樣，《楚辭》一名，則有三種含義：既指戰國時代楚國出現的一種新體詩，也指屈原以及後來其他作家用這種體裁所作的詩歌，又指劉向將這些詩歌選編而成的一部詩歌專集。

作爲一種詩歌體裁，《楚辭》的基本特徵是什麼呢？宋人黃伯思解釋說：『屈、宋諸

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諵、蹇、紛、侘傺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蕙、若、芷、蘅者，楚物也。」（《宋文鑒·校定楚辭序》）黃伯思的解說，除有小誤外（如他說《楚辭》押韻與否，可以自由定奪則非，現傳《楚辭》中的不協韻之處，是由於訛脫或傳寫之誤，非是原文不韻），基本上較為允當。《楚辭》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和獨特的藝術風格，是《楚辭》作為一種新體詩的基本特點。

任何文學種類的產生，都植根於民間文學的沃壤，楚辭的產生也不例外。在楚辭產生之前，我國南方便流行一種帶有地方色彩的民歌，這種民歌，由於沒有像北方民歌（如《詩經》）那樣被人們收集成書，所以，我們現在能見到的這種在形式上與楚辭相類的民歌，只有如《孺子歌》、《徐人歌》、《越人歌》等為數不多的几篇（保存在故書中的先秦南方民歌，可參觀逯欽立所輯《先秦漢魏南北朝詩》）。這些南方民歌，是楚辭產生的基礎，詩人屈原，正是在這種民歌的基礎上，創造出楚辭這一新的詩歌體裁。楚辭突破《詩經》以四言為主的句式，篇幅的長短隨內容的需要而定，极大地提高了詩歌的表現力。屈原用他開創的這一新詩體，開始了我國詩歌的個人創作的新時代，在我國詩壇上，率先用詩歌來抒發自己的情感，創作出了形象鮮明生動、十分富有個性的詩歌，對以後的詩歌創作，產生着巨大的影響。楚辭的出現，標誌着我國古代詩歌發展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是我國詩歌史上繼

《詩經》之後，又一個新的里程碑。

屈原創作的《九歌》，最能說明楚辭的先聲——南方民歌對楚辭產生的影響。王逸《楚辭章句·九歌序》說楚人信鬼好祀，其祀，必作樂歌鼓舞以悅諸神，屈原對此耳濡目染，因感其歌詞水平低劣，故對其進行再創作，於是寫成《九歌》十一篇。屈原筆下的《九歌》，藝術形象鮮明，感染力極強。這種藝術性極高的祭神樂歌，遠非民間巫歌所能比擬，但《九歌》的創作，從內容到形式，又確以民間巫歌為根底，無有巫歌，豈有《九歌》？其不同處在於：巫歌是民歌，《九歌》是學習民歌後的再創作，是文人的詩作，二者既有淵源關係，又有質的不同。

二

屈原是《楚辭》的創造者，也是楚辭最主要的作家。屈原名平，與楚王同姓，出身於楚國貴族。由於史料不足，我們不能詳知屈原的生平，目前，我們只能從《史記》以及屈原的作品中，粗略地知道一些屈原的情況。據今人浦江清推算，屈原約生於公元前三三九年（《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屈原所處的時代是戰國中晚期，當時的時局已由戰國初期諸雄並立發展到秦、齊、楚三強鼎立，也是秦國打破這種格局，楚國由盛到衰的轉折時期。戰國前期，楚悼王用吳起為相進行變法，吳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

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史記·吳起列傳》）吳起的變法，沉重地打擊了楚國的舊貴族，遭到舊貴族的仇恨，楚悼王死後，舊貴族勢力抬頭，吳起的變法遂告失敗。但由於吳起改革所帶來的成果，使楚國一度強大，也具備了統一天下的條件。楚懷王執政初期，也曾勵精圖治，他起用主張改革的屈原，修明法令、聯齊抗秦。楚懷王曾於公元前三一八年（楚懷王十一年）擔任六國縱約長，屈原一生中在政治舞臺上最活躍的時期，大概就是在楚懷王爲縱約長的前後幾年。《史記·屈原列傳》敘述屈原在那時期的情況是：「（屈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屈原的改革主張以及他的精明幹練、剛正性格，受到舊貴族與讒佞之人妒恨和攻訐。大約在公元前三一三年（楚懷王十六年），屈原終於因小人進讒而被楚懷王疏遠。《史記·屈原列傳》記載了這件事的始末：「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當時的形勢是『橫則帝秦，從則楚王』（劉向《戰國策敘錄》），秦國的『連橫』主要針對齊、楚聯盟。楚懷王親近小人，疏遠屈原，背棄屈原制定的對內改革、對外聯齊抗秦的政策後，楚國的形勢便迅速發生了變化，在以後十餘年中，楚國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屢遭

秦國的沉重打擊，使原已具備的統一天下的條件蕩然無存。在屈原被懷王疏遠後，秦國派張儀到楚國，以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爲誘餌，說楚懷王絕齊，以達其破壞齊、楚聯盟之目的。這時的楚懷王昏庸貪利，政治上既無主見，又無遠見，聽信了張儀的謊言，馬上與齊絕交。楚懷王受騙後，惱羞成怒，於公元前三一二（楚懷王十七年）『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史記·屈原列傳》）

大概楚王通過這次慘痛教訓，認識到絕齊親秦是死路一條，於是，他又派屈原出使齊國重修舊好。秦國懼怕齊、楚再度聯盟，就在屈原出使齊國期間，於公元前三一一年（楚懷王十八年），以漢中一半地割讓給楚國爲條件，要與楚國講和。楚懷王對張儀恨之入骨，說不願得地，願得張儀。張儀到楚國後，買通楚懷王的近臣靳尚，靳尚一面積極地爲張儀開脫，一面用謊言說動懷王的寵妃鄭袖，通過鄭袖勸說楚懷王放走了張儀。張儀走後，『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史記·楚世家》）公元前三一一年至前三〇六年（楚懷王十八年至二十三年）這幾年間，楚懷王沒有重新重用屈原，楚國也無多大發展。

公元前三〇五年至公元前二九九年（楚懷王二十四年至三十年），楚懷王在秦國的不斷

威逼利誘下，再度背齊親秦，結果使楚國在這幾年中發生了急劇變化，楚懷王不僅葬送了楚國的前途，也將自己送上了絕路。公元前三〇五年（楚懷王二十四年），楚懷王背齊和秦，與秦聯姻。此後第二年，楚懷王與秦昭王在黃棘聯盟。第三年，齊、韓、魏三國因楚背叛縱約而共伐楚。至此，楚、齊等國的『合從』已完全破裂，於是，秦國便在公元前三〇一年（楚懷王二十八年），聯合齊、韓、魏共攻楚，大敗楚軍，殺楚將唐昧。前三〇〇年（楚懷王二十九年），秦再度攻楚，取楚國八城，並脅迫楚懷王到武關會盟，楚懷王不聽昭雎等抗秦派的勸阻，在親秦派子蘭等人的慫恿下，貿然入秦，結果被秦兵劫持到咸陽，秦昭王要挾楚懷王割地，楚懷王不答應，便被秦扣留，公元前二九六年，楚懷王死於秦。楚懷王二十四年至三十年這幾年，屈原仍未得到楚懷王的信用，朝政依然掌握在舊貴族與親秦派手中。屈原的《離騷》和《九章》中的一些篇章，反映了他在楚懷王朝由被信用到被疏遠的生活經歷，與羣小鬥爭的過程以及他由此而發的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

當楚懷王被秦扣留時，楚國立太子橫爲國君，是爲頃襄王。秦兵連年入侵楚國，使飽受兵災之苦的楚國人民普遍產生了共同抗秦的心理，特別是當楚懷王靈柩從秦歸楚時，『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史記·楚世家》）。這是楚人復仇怒火燃燒到頂點的表現，如果楚頃襄王能及時地修訂內外政策，調動楚國人民的力量，那麼，楚國重振旗鼓，恢復元氣，收復

失地，統一天下，也不是沒有可能。屈原也曾對楚頃襄王寄予希望，他議論國政，斥責佞臣，希望進用以施行『美政』，使楚國重新富強起來。屈原的言行使舊貴族和讒佞小人對他更加仇恨，『令伊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史記·屈原列傳》）。楚頃襄王的昏庸，比之楚懷王有過之而無不及。屈原被楚頃襄王放逐後，從此再也沒有重返政治舞臺。屈原被放逐以後的事跡，史傳不詳，只是從他的《九章·哀郢》中得知公元前二七八年（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破郢後他還在世，以後的情況，目前也只能從《九章》中得知一二：他被放逐到江南僻遠之地，到過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從此生活在江南放逐之地，再也沒有回到楚國的首都，據《史記·屈原列傳》，屈原最後自投湖南省的汨羅江而死。至於他的卒年，由於資料匱缺，目前尚無定論，從屈原的作品看，他的卒年大概在白起破郢後不久。屈原眼看楚國在強秦接二連三的重創下進一步衰落，再也無力與各國爭雄，而亡國的命運正在步步逼近，屈原便投水自殺，以身殉國，以死殉志。

屈原的作品，《漢書·藝文志》所錄的篇數為二十五篇，但《藝文志》未記下具體篇目。王逸在其《楚辭章句》中，明確認定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是：《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各一篇。王逸所言，亦非定論。屈原究竟有哪些作品？迄今仍未有統一的認識。根據多數學者的意見，屈原的作

品，比較可靠的有《離騷》、《九歌》、《九章》、《天問》。關於屈原作品的真偽問題，筆者在選注中分別就一些有爭議的篇章談了自己的看法，此不贅述。

在屈原的影響下，楚國又產生了一批楚辭作家。據司馬遷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宋玉是繼屈原之後重要的楚辭作家，他大約在楚頃襄王時期做過小官，很不得志，且又缺乏屈原那種剛正之氣，後被免官，終不復用。宋玉嚮屈原學習，從事楚辭創作，藝術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宋玉的作品，《漢書·藝文志》所錄的篇數是十六篇，王逸在《楚辭章句》中明確認定宋玉的作品有《九辯》、《招魂》兩篇，除《九辯》被大家公認是宋玉的作品外，《招魂》是否為宋玉所作，至今仍無定論。唐勒和景差的作品沒有流傳下來，關於《大招》的作者，王逸說是屈原，又說可能是景差，曰：『疑不能明。』亦未斷其是否。

三

屈原是一位思想敏銳，具有一定進步思想的政治改革家。屈原雖然沒有留下闡述他政治思想的著述，但從他的詩篇中，我們能夠得知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概括起來，主要有愛國愛民、修明法度、舉賢授能等幾個方面。

早在青年時代，屈原就在其《橘頌》中，通過歌頌橘『受命不遷』、『深固難徙』的本

質特徵來表達他對祖國的熱愛之情。屈原在政治上屢遭無情打擊後，本可以離開楚國，另尋施展自己才能的去處，如商鞅離衛到秦推行變法；或可同縱橫家之流，如張儀、蘇秦，東游西說，獵取個人的功名富貴。但屈原有着堅定不移的愛國精神，無論如何他都不願離開故國，屈原的愛國思想，在《離騷》、《哀郢》等篇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具有愛國思想的人，必然愛護人民，關心人民的疾苦，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屈原的愛國思想與愛民思想是一致的，特別是當他成為逐臣以後，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人民、了解人民。郢都陷落，生靈塗炭，屈原憤怒地質問這是誰之過：『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哀郢》）民富國強，國泰民安，是屈原思想的根本所在，也是屈原為之終身奮鬥的目標之一。此外，屈原的愛國思想是與忠君思想結合在一起的。諸如『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離騷》）、『輯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哀郢》）、『專惟君而無他兮，又眾兆之所讎也』（《惜誦》），等等。實際上，屈原是將君王作為國家的象徵，因為古代有君在國存、君歿國亡的觀念，所以在屈原看來，忠君與愛國是不矛盾的，忠君是愛國的一種表現。他希望通過輔佐君王來實施『美政』，實現強國的理想。當昏庸的楚王聽信讒言，不能理解、支持屈原的政治主張，反而打擊迫害屈原時，屈原則警誡楚王要以國事為重，親賢者，遠小人，甚至批判楚王的昏庸，這就與『愚忠』不同，與楚國那幫貌似忠君，實為姦賊的『黨人』更不同。當然，屈原將忠君與愛國結合在一起來認識，

他對楚王警誡與批判的目的，也僅僅是希望楚王覺悟，這是輔君興國思想對他的制約，也是時代和階級對他的局限，我們不必苛求他，但我們卻要透過他的忠君的表象，看到他愛國的實質。

屈原是楚國繼吳起變法之後，又一個具有改革思想的人物。他曾『造爲憲令』，替楚懷王草擬治國大法，守舊派人物上官大夫因想窺知大法的內容未果而讒害屈原，終於導致發生了屈原由『王甚任之』到『王怒而疏屈平』這樣的事件。屈原闡述自己改革思想的條文，我們現在無從看到，但從《離騷》、《九章》中他反復強調繩墨法度、舉賢授能看，知道這是屈原改革思想中的兩個具體內容，也是屈原『美政』主張中的重要部分。屈原的這些思想主張，符合楚國當時的國情，具有一定的進步性。

戰國是百家爭鳴的時代，各種學派，各個政治家、思想家都在探索興國之法、統一之道。屈原的思想受儒、法兩家影響較大，但屈原的思想既不完全屬於儒家，也不完全屬於法家，屈原從社會發展的實際出發，對衆說擇善而從之，從而形成他自己的思想——能使民富國強，完成統一大業的屈原思想。如儒家言必稱堯舜湯武，法家則反對法先王：『今有美堯、舜、鯀、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韓非子·五蠹》）屈原是稱道堯舜湯武的：『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湯禹儼而祇敬兮，

周論道而莫差』、『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離騷》）、『堯舜之抗行兮，瞭查查而薄天』（《哀郢》），等等。儒家言必稱堯舜湯武，在現實生活中死搬儒家教條，不思變通，故遭到法家的猛烈攻擊。屈原所欣賞的，是這些先王治國安民的雄才大畧和豐功偉績，而且這種贊賞是有針對性的，即希望楚王能以這些聖君明主爲榜樣。同時，這些先王也是屈原觀念上的忠君模式，是他忠君愛國的思想基礎之一。

又如，同是治理國家，儒家講德治，法家講法治。屈原既講德又講法。講德如『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唯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離騷》）。『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懷沙》）。講法如『國富強而法立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淝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惜往日》）。『固時俗之工巧兮，偈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離騷》）。儒家宣揚禮義仁德，主張『王道』，其說雖有可取處，但欲在戰國時期以此來統一天下實屬不可能。法家以法治『爲治之本也』（《商君書·定分》），法治思想，有其進步性、可行性的一面，但法家主張以嚴刑來貫徹法治，如『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商君書·開塞》）；『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韓非子·姦劫弑臣》）。法家的做法雖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它那殘酷鎮壓的一面，以及由此使統治者更爲獨裁專制，終將給人民帶來更多的苦難。屈原既講以德服人，仁厚爲

懷，又講修明法度，革新政治，實則是融儒家民本思想和法家法治主張之精華為一體的新思想，在當時不失為一種辯證的、進步的思想。

再如儒家、法家和屈原都說舉賢任能，儒家呼籲『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孟子·公孫丑》上），但儒家所謂的賢能之人，是受尊卑之禮制約的，出身微賤的人沒有資格被『舉賢』。法家雖然提倡舉賢授能應當不拘一格，但法家的『賢能』標準，是看其推行法治得力與否，如『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韓非子·有度》）；『以其能，為可以明法，使國利民，從而舉之』（《韓非子·說疑》）。由於法家將法治擺在首位，以為只要有法，便可以治國，有無能人，則關係不大，故法家實際上是重法不重人。屈原認為要把國家治理好，不僅要有『美政』，人才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離騷》反映了屈原這一思想以及他為此而作出的努力。從屈原所列舉的咎繇、伊尹、傅說、呂望、百里奚、甯戚等出身奴隸或微賤的賢能之人看，屈原不贊成儒家舉賢授能必須遵循尊卑之禮的原則。屈原所列舉的能人，都是歷史上的政績卓著者，思想上都談不上分屬於哪一『家』。屈原認為，只要符合時代的發展趨勢，實施正確的方針政策，使國家強盛者，就是賢能之人。在楚國，沒有『美政』不行，沒有賢能之臣也不行，二者互為表裏，缺一不可。

屈原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奮鬥了一生，盡管他是失敗者，但他為堅持理想而『九死未

悔』、『體解未變』的精神，決不變心從俗的鬥志，卻是非常可貴的。

四

屈原在政治上失敗了，但在另一個領域——詩歌創作中卻獲得了巨大成功。屈原創造性地把浪漫主義創作方法推嚮了高峰，他的作品，達到了思想和藝術、內容和形式、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完美統一，他那『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文心雕龍·辨騷》）的不朽詩篇，使他成爲一個偉大詩人。屈原作品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以現實主義爲基礎，以浪漫主義爲主導，以《楚辭》的形式，將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在屈原之前，浪漫主義創作方法就已存在於神話傳說中，但那時還停留在口頭創作上，處於原始、自發、低級的階段。屈原的詩篇，借助於神話傳說、豐富的想象、奇特的構思、大胆的誇張，『精驚八極，心遊萬仞』（陸機《文賦》），不受時空的限制，更爲自由、深刻、準確、形象生動地表現自己的思想情趣、好惡愛憎，藝術上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在屈原之前，還沒有一個詩人自覺地探索和運用浪漫主義方法於自己的創作之中，屈原是第一個用浪漫主義方法來進行創作的詩人，同時，他又以自己的詩篇豐富、完善了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理論內涵與創作實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屈原的作品是中

國文學浪漫主義創作方法之源。屈原的創作，是以現實生活為基礎的，他的許多詩篇，具有強烈的批判現實的精神。屈原對現實的批判，是有機地結合在他的浪漫主義創作之中的。屈原的創作方法，總體說來是浪漫主義的，但也不排斥現實主義。如《離騷》第一部分着重描寫屈原在現實生活中的鬥爭經歷，比較容易使人感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對詩人的影響。第二、三部分着重描寫詩人對理想的追求，這兩部分則突出地體現了浪漫主義創作方法。即便如此，第一部分也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情調，而第二、三部分的描寫也未忘卻現實：『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已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九章》中也有這類例子，如《涉江》是述行言志的詩篇，但第一段卻用浪漫主義手法來表現自己堅持理想和美德的信念。表現在屈原作品中的這兩種創作方法，雖有主次之別（《離騷》主要用浪漫主義創作方法，《九章》主要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但無截然之分，正因為它們有機地結合，才使屈原的作品既富有神奇的色彩、藝術的魅力，又充滿戰鬥力、批判性，才使屈原作品的思想和藝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評屈原楚辭『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正揭示出屈原作品善於將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這兩種創作方法融為一體的特徵。屈原創作的楚辭，除《九歌》基本上用浪漫主義方法來創作『神曲』外，《離騷》和《九章》則基本體現了屈原對這兩種創作方法的結合運用，而